

岳  
谦  
厚  
著



顾  
维  
钧

外  
交  
思  
想

研  
究

人  
民  
出  
版  
社



岳谦厚 著

顾维钧

外交思想

研究

人民出版社

# 本书得到山西师范大学社科基金资助

责任编辑:杨美艳

装帧设计:徐 晖

版式设计:诸晓军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顾维钧外交思想研究/岳谦厚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2

ISBN 7-01-003455-9

I. 顾…

II. 岳…

III. 顾维钧(1888~1985)-外交-思想-研究

IV. D829

## 顾维钧外交思想研究

GUWEIJUN WAIJIAO SIXIANG YANJIU

岳谦厚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年12月第1版 200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11.125

字数:258千字 印数:1-2,000册

ISBN 7-01-003455-9/K·698 定价:20.00元

## 序

魏宏运

岳谦厚博士在南开研读六年,致力于顾维钧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顾维钧与抗日外交》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引起学界的注意。博士学位论文《顾维钧:民国职业外交家个案研究》答辩时深得李文海、丁守和等有关专家好评,答辩委员会一致认为论文开拓了民国外交史研究之新视野,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并无近代意义之外交。礼部和理藩院都是以居中驭外之“天朝”或“上国”为理念,为接待藩邦、属国或外国贡使而设立。其本身是以“上国”与“夷狄”之间不平等关系作前提,此种格局至道光咸丰年间为东来的西方人两次以炮舰所破毁。西方列强用炮舰向大清帝国表明:他们不是贡使,他们是执行其国家之使命,通过外交途径订立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丧权失土,铸成百年之痛史。与此同时,西方近代外交知识的输入,促成中国近代外交意识之萌芽,逐渐超越了只有朝贡而没有外交的传统观念,走向同国际政治接轨的道路,遂有总理衙门、外务部,直至外交部之成立。此乃中国政治制度亘古未有之大变局,无疑为历史之一大进步。

清季总理衙门之创立与运作,及相继遣使出洋,产生了中国近

代第一批外交官。而这批外交官中虽不乏像郭嵩焘、曾纪泽、张荫桓等“不可多得之才”，但一般既未受过专门训练，又不精通近代外交知识，也不习外文，对外交涉仅取西方知识之皮毛，掉市井之油腔滑调，美其名为外交辞令，即使丧权辱国，亦云“欣然同意”，不知外交为何事，国耻为何意（参见王尔敏撰《晚清外交思想的形成》，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期）。这些人从整体上讲，依然是封建官僚阶层之一部分，素质低劣，愚昧无知，民族意识淡漠，封建的习俗、腐败的官风在其身上不时地地表露出来，当时外交失败他们应承担一定责任。对此，洪钧培有言：“今日之世界，一外交的战争之世界也。一国有特出之外交人才，其国之外交，往往博得胜利。否则其国外交，无有不败者。我国闭关数千年，对外素少往来，外交学识，素不注重。是以对外通商之后，对于他国不发生交涉则已。一旦发生交涉，无不败于外交官之手，故考我国外交失败之原因，一言以蔽之曰，缺乏外交人才而已。”（洪钧培著《国民政府外交史》，上海华通书局1930年7月版，第5页）其论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从另一角度亦能见合理成分。历史学家孟森评论道：“外使之来，苟非崩角稽首，而与为姑容，其耻甚于亡国。宁以社稷为殉，不使夷虏踪迹相浼。得正而毙，虽败犹荣。此当时之舆论然也。”（《清咸丰十年洋兵入京之日记》，《第二次鸦片战争》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46页）其论可谓能中肯綮。这种传统的夷夏之见曾主导了晚清相当多的外交官之思想或中国的外交主张。

民国创立之后，中国外交体制经历了一次革命，同化于现代国际政治之中，中国外交官之素质获得大幅度提高。新制度确立了一套有机的外交官遴选与任用原则，使大量拥有近代外交知识，通

晓国际政治与法规之专业人才投身外交事业。特别是数目可观的接受西方教育的归国知识分子被引入外交机构,外交人员之整体素质大为改观,形成了一支职业化的外交队伍。而相当多的外交官又长期服务于外交界,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家)群体遂由此产生。

考察民国一代职业外交官(家),以服务年限和成就论,当以顾维钧为最。其从事外交工作达 55 年之久,近世罕有其匹,是为真正职业外交家;其在国内职位高到国务总理(北京政府时期)和外交总长(或部长)等职,在国际上历任国联理事会主席、联合国海牙国际法庭副庭长等要职,以著名的国际政治家身份,参与了诸多中国和国际重要事务,是为现代国际政治与外交发展之历史证人。基于此,研究顾维钧,是对民国外交史、政治史,乃至国际关系史进一步理解和深化的基础。

岳谦厚博士多年来独自伏案钻研,博览群书,探索顾维钧这个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人物。他的研究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其论述颇有独特见解。从研究方法观之,以下几点最为突出:

一、作者没有将眼光局限于顾氏一生之历史再现,而将其主要精力集中于顾氏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思想与行为、个性品格与政治心态等核心要件的解释与分析。对顾氏思想与行为之解析,则将其置于近现代国际政治变动以及国际关系发展的大环境、大气候中加以操作,同时又兼顾了国内政治等方面的现实境遇,是一项宏观、微观兼而有之的全面性研究。其既便于从中探讨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又可避免产生以偏概全的谬误,亦体现了作者立论与观察历史现象的水准。而作者在此项研究中,取一种理论的与案例的分析方法,则使之目的明确、重点突出,广度与深度愈益彰显。

二、顾氏为国民国外交、乃至政治的历史证人,研究其政治走向、外交思想与行为,不能不牵涉到对整个民国政治与外交的考察,而民国政治变动的过程亦不可能不在顾氏身上留下其印痕。反过来,顾氏本人的思想与行为又必然对民国政治与外交发生某种影响。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互向的。这一点正是作者研究之一大中心脉络。

三、作者在以历史学研究方法为主的基础上,引入了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法学、外交学及国际政治学等学科理论及其方法,将中国近现代外交史或国民国外交史研究推之于更广更深的层次,亦拓展了该领域研究的理论视野,并据此作出了诸多的客观判断,提出自己新的论据新的看法。这无疑对推动多门学科的综合研究,大有裨益。

研究学问是要经过一段艰难的历程,可能会遇到种种难以解答的问题,但不能知难而退,只要孜孜不倦,总会达到自己向往的真理。岳谦厚博士的研究已经取得成果,我祝愿他以自强不息的精神继续走下去。

2000年4月20日

识于南开园饔斋

# 目 录

序 .....	魏宏运 (1)
---------	---------

## 绪 篇 回顾历史·剖视典型

一 近代外交失败与民国职业外交家勃兴 .....	(3)
二 一个典型——顾维钧 .....	(14)
三 本书主旨及内容 .....	(18)

## 上 篇 外交思想·外交行为(1912—1945)

——一种案例的分析

一 “联美”与“赖美” .....	(23)
1. 早期中美关系概况 .....	(23)
2. 外交家的美国观 .....	(28)
3. “联美”与“赖美”思想确立及其影响 .....	(32)
二 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上) .....	(48)
1. 外交相对独立与“国民主权”外交原则(一) .....	(48)
2. 外交相对独立与“国民主权”外交原则(二) .....	(58)
3. 外交相对独立与“国民主权”外交原则(三) .....	(65)
4. 民国外交弊端的检视 .....	(80)
三 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下) .....	(85)



1. 外交自主:废约实践考察 .....	(85)
2. 主权原则:若干实例解读 .....	(106)
3. 自卫原则:日本九一八“自卫”之说驳论探析 .....	(120)
四 现实主义与和平主义 .....	(136)
1. 外交谈判中的现实主义 .....	(136)
2. “国联外交”中的和平主义 .....	(160)
五 走向未来的脚步:中国外交的过去与现在 .....	(180)

## 下篇 政治走向·心路历程(1946—1956)

——一个纵向的历史考察

一 中性准则:外交家前三十余年的立业之道 .....	(187)
1. 中西文化寓于一体的二元价值观 .....	(188)
2. 政治上的“超然”主义 .....	(189)
3. 冠名国民党的隐衷 .....	(197)
4. 无法克服的内在张力 .....	(200)
二 十字路口:自由主义者的两难 .....	(205)
1. 美国对华政策的政治目标 .....	(207)
2. 多元政治实验的运作 .....	(211)
3. 多元政治理想的破灭 .....	(223)
4. 中国自由主义的多舛命运 .....	(231)
三 选择历史:政治天平失衡 .....	(236)
1. 国民党政权的剧烈摇动(1946—1948) .....	(236)
2. 政治取向的偏执 .....	(241)
3. 政治偏执之因 .....	(250)
四 “流亡”苦旅:政治固执与心灵困窘 .....	(254)

---

1. 朝鲜战争时的台湾问题·····	(255)
2. 对日和约中的尴尬·····	(270)
3. 美台条约——寻找庇护的代价·····	(276)
4. 继续寻求庇护与美国“冷漠”的回应·····	(295)
5. 使命终结·····	(302)
五 历史回眸：两个惊人相似的现象·····	(307)
<b>附录一：顾维钧事略</b> ·····	(321)
<b>附录二：参考书目</b> ·····	(334)
后 记·····	(345)

绪  
篇  
回  
顾  
历  
史  
·  
剖  
视  
典  
型



## 一 近代外交失败与 民国职业外交家勃兴

这里所谓的“近代外交”，实际上是晚清外交，也即中国晚清政府同西方列强的交往与交涉（严格地讲，完整的近代中国外交应包括晚清外交和民国外交）。有关晚清外交失败之造因，史不绝书，我不想做过多的叙述，只是为了觅寻到一个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切合点，更注重了人的因素（包括观念的、思想的以及政策的等主观方面的因素）的分析。至于其余因素，有的提及而不作具体研究，有的根本不提及，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并不表明本人有意淡化或忽视这些因素。

近代中国外交失败以南京条约的签订为嚆矢，自此中国对外之威信始坠。外交已不再是传统意义的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炫耀威势和显示强盛的手段，而是决定中国社会走向的致命因素。近代意义的中国外交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与丧权失地紧密地盘缠纠缠在一起，其失败之造因既有主观的又有客观的，是诸种复杂因素交相作用的结果。民国时期的外交史家洪钧培分析道：“今日之世界，一外交的战争之世界也。一国有特出之外交人才，其国之外交，往往博得胜利。否则其国外交，无有不失败者。我国闭关数千年，对外素少往来，外交学识，素不注重。是以对外通商之后，对于

他国不发生交涉则已。一旦发生交涉,无不败于外交官之手,故考我国外交失败之原因,一言以蔽之曰,缺乏外交人才而已。”<sup>①</sup> 具体而言,有次列数因:(1)不知以实力作后盾;(2)外交官之颀硕;(3)外交官之媚外;(4)不能识别对象;(5)误以为联合即亲善;(6)滥用交际;(7)国民缺乏外交常识,等等。<sup>②</sup> 洪先生之分析,更多地注重了外交方面人的因素——主观因素,忽视了近代技术革命给世界政治带来的重大影响——客观因素,技术革命在短时间内便改变了各国间的实力对比,对中国提出挑战的对手是若干完成近代化的国家,实力的弱小使中国外交不得处于弱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落后就得丧权失土。我们必须承认外交人才的稀缺和外交知识的贫困是近代中国外交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有关近代中外交往的史料以及中外关系的著述无不表明这一点。

关于晚清近代外交思想或意识的贫困,台湾学者王尔敏指出:研究晚清外交,必须从中外接触始。“中外接触,在清代人士心目中,可以立即勾起夷夏区别的意识。跟着而来的是对外态度,也多半是从古老的传统中找根据,小半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形成。但是古老的历史传统,即使参考儒家经学,列国盟聘,史不绝书,外交仍是最需要讲求。而另一种参考的范围,不限于诸夏的列国,而是中国与四夷之间的关系。当然,两者意义该是同被参考和取法,而不幸的是当时的对外态度强调文化意识,尤着重于夷夏之防。严格分明界限,再加上文化的优越感,心理上形成深闭固拒,而自我蒙蔽对他人的了解,不免真正成为盲目自大。无可否认,当时朝野官

①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8辑,洪钧培著:《国民政府外交史》,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年11月版,第5页。

② 洪钧培著:《国民政府外交史》,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年11月版,第5—9页。

绅对外的轻视倾向,大过一切的对外态度。”<sup>①</sup>但晚清在被动中为人打开外交之门、不可避免地与强敌接触时,又自我安慰地用传统中“天下一家”和“四海皆兄弟”的观念支配其外交,“和戎”便成为一项固定的外交原则。无论清政府和外国人的矛盾如何尖锐,操持外交者却始终能够坚持“和戎”的立场,以致为避免轻启战端而极尽委曲求全,然国家终不能免于列强之剥削。中国近代外交受传统观念影响而丧权失利的事例,数以十计。

晚清开关初始,近代外交意识的贫困导致国家主权观念朦胧,世界性眼光被遮断。陈旭麓指出:当时中国主管对外事务的官员,一般非常自然地带着旧传统的全部惯性去对付一个陌生的对手。在他们手里,“外交上制服夷人的取胜之道不在于面对面地抗争折冲以卫护国家实利和主权,而在于精神上施以贬抑和折辱。”这种来自传统夷夏之见的意气与成见使其面对近代的外交对手不可能产生近代的外交意识。<sup>②</sup>他们所关心的只能是保全华夷之间的藩篱和沟壑而不在于中国主权。如《天津条约》签订后,大学士桂良等人与西人重开谈判,期以废除关税为代价,换取西人放弃公使驻京、江路通商、内地游历和归还广东省城。关税关系全国经济命脉,自在国家主权范畴,关税权和海关人事权之丧失实为中国丧失一切权利的重要根源。后来的历史学家孟森对此评论道:“外使之来,苟非崩角稽首,而与为姑容,其耻甚于亡国。宁以社稷为殉,不使夷虜踪迹相浼。得正而毙,虽败犹荣。此当时之舆论然也。”又

① 王尔敏:《晚清外交思想的形成》,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期。

②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90—91页。

说：“进口货且不能收税，洋人重利，其于驻使一层，必可暂缓留作后图，而洋货之灌输，海关之不必设，中国又成何世界？此皆一回首而令人拮舌者。”<sup>①</sup>直到欧美国家来华立约通商骤增，再加上历次战争的冲击，晚清官绅知识分子才逐步领略到中国已置身于亘古未有之变局，了解到欧美列强实构成世界政治的重心，中国居于列强并峙之中，不仅不能以言万邦之主，也不能与列强争持敌体，从而动摇了历史传统中的天朝至上的观念，开始接受新的外交知识和国际关系法则。其中国人最感兴趣的国际知识是万国公法，而这多半由于固有传统中有相类似的东西，容易相互吸引与融合，如春秋三传与周礼。从了解中国自身所处的国际地位到国际公法的意义，促成了晚清国家主权观念的滋生。

近代外交知识、国家主权观念的淡薄又导致晚清政府外交政策缺乏连续性和可操作性，甚至在相当的时间里出现外交方针“真空”。虽然当时对外交涉也遵循一定的轨辙，一定的原则，但不能视为国家的固定外交政策，因其只是被动的外交适应，在个别涉外事项中偶然出现。从严格的意义而言，晚清政府并没有形成固定的可操作性的外交政策。中外自通商始，中国对外政策先是中外所熟知的久为清代制裁外夷的“用官以制商”、“用商以制夷”的原则，继而随着列强相继入侵，又广泛施用历史传统中悠久的“以夷制夷”政策。无论是商业抵抗政策还是“以夷制夷”政策，数世纪以来，以迄今日，西方大国无时不在运用，晚清政府所失者乃在于或赋予其过高的估计和期望，以致形成滥用，或既不知彼亦不知己，

<sup>①</sup> 《清咸丰十年洋兵入京之日记》按语，见《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46页。



逞其虚骄而盲目运用,这在既无实力作后盾,也无周密准备的情况下,自然使外交因应趋于复杂,国家权益因之丧失愈益严重。国力不济,以夷制夷只是徒具空言理想而已。晚清末期,又从“以夷制夷”观念中衍生出了联合与结盟的政策,这本在国际政治中乃至现代外交发展中极具重要意义,无奈晚清人士上承春秋盟会之古老传统,下不顾及相对义务与自身实力,又不十分了解西方的均势理论,使其附带上了玩弄和偷苟之意。如甲午战败,李鸿章试图“联俄制日”,与俄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结果引狼入室,并招致西方各国瓜分在华“势力范围”的狂潮。

胡秋原则将晚清外交分为两个时期,一曰妄自尊大时期,一曰妄自菲薄时期,两者以中日甲午战争为界限。前期“对于当时纷纷东来要求通商的外人,清廷的态度是能拒绝即拒绝,多方加以阻挠”,接着“给予他们以有限度的通商范围,以满足其一部分之愿望而求相安”。“至于中国许外人通商,乃是朝廷给予外人的一种特殊恩典”,而不知世界有通商之事,尤视海道为畏途;后期妄自尊大的虚弱本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彻底撕破之后,朝野上下渐渐丧失了自信心,由排外变为畏外和媚外,特别是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在政治上“带上了严重的镣铐,而民族精神,亦自此萎顿”。妄自尊大与妄自菲薄是一对孪生子,都源于无知。“由于中国不知世界大势,不知中国自处之道自强之道”,“而在糊涂迷惘畏葸因循之中,造成百年之痛史”。在屈辱的外交中,所谓“以夷制夷”,不过是“依夷制夷”而已。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外交失败是其弱而愚的结果。<sup>①</sup>

① 参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2辑,胡秋原著:《近百年来中外关系》,台湾文海出版社1971年3月版,第8—10页。